

蔣介石與西昌

蔣治平

(本文插圖刊第4頁)

西昌地緣戰略價值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一日，先總統蔣介石在臺北復行視事，重整革命隊伍，挽救國家危亡。這時，整個中國大陸紅潮泛濫，只剩下一個孤城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繼續與共黨作殊死戰！這個孤城就是位於川康滇三省邊區西昌。

抗戰初期，蔣公即開始部署西昌為一長期抗戰基地。勝利後，曾親赴西昌巡視各項建設，並就近督導消弭雲南政變。戡亂之役，當西南形勢逆轉之際，蔣公曾一再考慮中央政府設於西昌，並要到西昌去長住，俟機反攻，收復失地，嗣改在西昌設軍事大本營，繼續作戰，相持達數月之久；當地漢夷人民英勇抗敵，為中國近代革命史增添光輝的一頁！

三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蔣公派今總統經國先生持親筆函飛西昌慰勞：「元靖（賀國光將軍）吾兄主席：茲派經國來寧慰勞，並面達一切，望予詳談為荷，順頌時祺。中正手啓。」函中所指「寧」就是寧屬，而西昌則是寧屬的首府。寧屬自漢武帝時代設越嶲郡開始，就已正式

納入我國的版圖。其地理形勢，南北以金沙江及大渡河為界，長約七百餘里，東西以大涼山及大雪山為界，廣約三百餘里，面積約六萬餘方里。其行政建制，漢時設越嶲郡，唐初改為嶺州，後為建昌府，元置建昌路，明改建昌衛，清為寧遠府；民國成立，劃歸四川省管轄。抗戰開始，中央為擴充西康的幅員，便於川康經濟之開發，乃將寧屬及雅屬併入西康省。寧屬行政區域計轄有西昌、德昌、會理、越嶲、冕寧、昭覺、寧南、鹽源、鹽邊九縣及寧東、普格、瀘寧三設治局。寧屬的地緣關係，隨着中原形勢的演變而改變。

(一)漢、唐時期：漢之西南夷，唐之六詔，均曾構成嚴重之邊患，寧屬首當其衝；但蜀漢諸葛武侯南征用兵，却由寧屬攻到滇池與迤西。

距今約二千餘年前，我國西南邊區有兩支為數頗眾的邊民，史稱西南夷。南夷據有今雲南、貴州一部份地區；西夷則居於川康滇邊境之地。據說南夷是一個强有力的部落，對於北面的夜郎常加侵擾，當時適值東漢崛起，治邊心切，乃派中郎將唐蒙運用武力平定了南夷；接着又由司馬

相如傳檄入寧屬，西夷亦聞風附降。

西南夷患平息之後，漢在各地設置七個郡，委派官吏，加強管理。這七郡是犍為郡（今四川宜賓、犍為等地）、牂牁郡（今貴州遵義、桐梓等地）、越嶲郡（今西昌、越嶲等地）、益州郡（今四川廣元、成都等地）、武都郡（今甘肅武都、陝西寧羌等地）、沉黎郡（今西康漢源以西之地）、汶山郡（今四川茂縣、松潘等地）。可見東漢時期，寧屬是上述七郡之一，其地位相當抗戰時期的省或行政專區。

降及蜀漢，諸葛武侯為北伐中原而南征蠻越。其在出師表中有「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兩句，今人多所考證，據說「五月渡瀘」的瀘水就是大渡河，也有說是雅龍江或金沙江的。一般認為武侯南征，最初進兵越嶲，越嶲即今之西昌。越嶲平定後，再推進到滇池，到迤西，到緬北。果如此，則寧屬是武侯當年南面用兵的前進基地。到了唐代，南詔起而叛亂，西南邊疆進入了極度動亂不安的階段，寧屬首當其衝。考南詔起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公元六〇五年），止於昭宗天復二年，二百五十餘年間，叛服無常。曾勾

結吐蕃入侵寧屬，並趁機攻陷雲南，弄得唐室岌岌不可終日。

(二)宋、元、明、清時期：寧屬既是邊陲緩衝地帶，也是遠征的出發點，更是夷患的滋生地。宋太祖趙匡胤鑒於吐蕃爲患，唐代或戰或和均不能解決問題，於是揮玉斧割棄大渡河以西之地，寧屬成爲西南邊區的緩衝地帶。

元世祖忽必烈經略緬甸、安南、爪哇等地，由寧屬出兵滇西前往，而邊境大規模的叛亂同時被鎮壓下來。

明代萬曆年間兩次大規模夷患都發生在寧屬越嶲，由四川總兵率師蕩平。

清代雍正、嘉慶、同治三朝曾發生普雄野夷叛亂，分由川、陝總督及貴州提督派兵進剿，建昌駐軍會剿。

(三)民國時期：寧屬是川康滇邊區交通樞紐，具有重要戰略價值，亦是消弭夷患用兵之地。

政府派兵進剿普雄夷患，先後計有五次，其主辦單位第一次爲民國九年之川康邊防總司令部，第二次爲民國十九年之寧屬夷務指揮部，第三次爲民國二十六年之國軍四十七軍，第四次爲民國三十四年之一三六師，第五次爲民國三十五年之西昌行轅。皆以當時之夷患影響整個邊區治安之故。

寧屬以西昌爲首府，九縣三設治局，土地面積六萬餘方里，人口約在八十萬至一百萬之間，經濟上可以自給自足，政治上亦由於歷代設置郡、州、府、衛，而早已形成一個較大的行政區域了。

西昌位於成都與昆明之間，爲川滇邊區交通孔道，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同時一方面與四川之雷波、馬邊、屏山、峽邊接壤；一方面與雲南之永善、巧家、華坪、永北隔金沙江相望，在推行邊務禁政以及開發經濟資源方面之關係密不可分，而地緣上尤屬一體。

寧屬在行政系統上爲西康省的一部份，而西康跨川藏之腹，扼新疆、青海之背，附雲南之肩臂，一般認爲是邊防上形勝之區，若從這個角度以觀，則寧屬的地緣價值更高一層。

八年抗戰積極經營

早在民國二十四年四月，蔣公曾在昆明偕龍雲乘專機巡視川滇邊境戰況，從空中觀察共軍狼狽西竄情形，所經路線，即寧屬、會理、德昌、西昌……等地。蔣公當時之用意，在藉以說明國軍分路進剿態勢，並指示戰略及戰術之要領，以堅定龍雲之信心。

十年後，即民國三十四年十月，蔣公親蒞西昌，就近督導消弭龍雲蓄謀已久的叛亂。這自然是在因西昌密邇昆明，具有地緣上的關係。

龍雲在抗戰期間割據稱雄，藐視中央政令，利用滇越鐵路走私販毒，破壞國策，爲所欲爲。日本投降，戰事結束，中央儲存滇境之美援裝備與軍經物資甚夥。龍雲竟策劃強行劫奪，以擴充武力與中共合謀叛亂。蔣公據報乃下令改組雲南省政府，撤銷昆明行營，調龍雲爲軍事參議院院長，這一切乃由軍統局長戴笠往返重慶、西昌、昆明傳達蔣公指示，責成駐滇國軍杜聿明部，在

兵不血刃的原則下，消弭禍亂於無形，也斬斷了中共早期伸向雲南的魔掌。

西昌，這個川康滇三省邊區的重鎮，爲西康省東南之政治、經濟中心。城圍九里，風光極佳，有二月榴花三月雪，一城春樹半城山」的讚語。城南十里瀘山，秀麗清雅，從山麓到山頂，古木參天，青松翠竹，景色極幽，寺院十數，隱現於林壑峯巒之間，紅牆綠瓦，更添無限景色，登臨遠眺，令人心曠神怡。城與瀘山之間有邛海，乃新莽時地陷而成，周圍約二十里，風帆片片，波光激瀾，景色絕佳。一日，蔣公偕夫人遊罷勝景歸來，心情十分愉快而告左右曰：我看前人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現在應該改爲「上有天堂，下有西昌」了。

蔣公在西昌的部署，始於抗戰初期，那是爲實施對日持久作戰而設計的。一個小型統帥指揮部，和中央政府於必要時遷往辦公的房屋，就在這個山明水秀的地方秘密建立起來，作爲陪都重慶的預備設施，以強化作戰部署，也顯示了蔣公領導全民抗戰到底的決心。

蔣公官邸所在地，名曰新村，西昌行轅專設一個處管理維護。蔣公駐節期間，除侍衛長俞濟時將軍及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將軍隨侍左右外，尚有宋子文、陳誠、關麟徵及經國先生等高級文武官員隨往，冠蓋雲集，極一時之盛。當時因處理龍雲調職事件，甚具敏感性，一切均在極機密狀況下進行，以上情形迄未見任何新聞媒體報導。惟蔣公偕夫人由西昌返重慶時，當地人民扶老攜幼夾道歡送，從新村到小廟機場約三十華里，

摩肩接踵，途爲之塞，其愛戴國家元首的熱忱，感人至深！蔣公西昌之行甚感滿意，返渝後不數日，即任命張篤倫爲重慶特別市市長，翌年，調張篤倫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此亦顯示西昌行轅在八年抗戰期間的經邊政績，獲得了蔣公的肯定。

分兩階段進行部署

蔣公部署西昌成爲抗戰與戡亂之重要基地，分兩個階段進行。民國二十八年二月至三十四年十月，是第一階段；三十五年一月至三十九年三月是第二階段。都會獲致預期的效果。

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確立川康滇邊區軍政協調指揮系統，乃戰略部署的第一個步驟。

二十八年年初，武漢會戰告一段落，統帥部進駐陪都重慶，抗戰形勢進入一新階段，一切都要作長期抗戰的打算。蔣公爲調整川康軍政結構，乃下令撤銷重慶行營，另成立成都行轅與西昌行轅，以承襲重慶行營之職權與功能；同時四川省政府改組，並將雅安與西昌等十五縣局併入西康，以便協同開發川康經濟。可見西昌自始就被置於極爲重要的地位，而爲蔣公佈置西南全局中的一個要點。

西昌行轅之編組，採精簡原則，主任以下設三組，第一組主管軍事交通，第二組主管政治經濟，第三組行政管理。另政治部主管政訓、文宣、保防、監察等業務。西昌行轅第一主任張篤倫，在任七年，調任重慶市長。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結束，西昌第一階段之戰略任務完成。

蔣公於是年十一月特派久歷中樞要職的賀國光到西昌坐鎮，則是第二階段戰略佈局的開始。賀氏新命發表前夕，蔣公延見，告以西昌地位重要，批准擴大行轅編制，增加員額，從速到任。翌年，賀氏屆退休之年，依例不能續任，蔣公在廬山牯嶺召見，特准延役。三十五年，爲因應時局變化，西昌行轅改制爲西昌警備部，三十八年升格爲西昌警備總司令部，支援策應川滇戰局，發揮了預期的功能。

趕築川滇西路，一則打通由樂山經西昌、會理到祥雲之交通動脈；一則以寧屬之存糧運補滇西，以應國軍遠征作戰之所需，這是西昌行轅當年最重要而又最迫切的一大任務。

川滇西路分段趕築，由樂山至西昌一段，簡稱樂西路，全長五一八公里，在寧屬境內路線係由農場起至西昌止，計一九四公里。另由西昌至祥雲段，簡稱西祥路，全長五六二公里，在寧屬境內路線，由西昌起至金沙江止，計二七一公里。兩路係於民國二十八年開始修築，三十一年完成通車。境內羣山交錯，河川阻隔，工程十分艱險，但西昌行轅動員百萬民工日夜趕工，終於如期完成。三十六年秋，蔣公會指派杜聿明前往考察，會商加強軍需運補及戰略支援辦法。從彼時起，西昌已在軍事上與駐滇國軍取得有效之聯繫與配合。

開發經濟資源，建設西南國防，乃西昌行轅前後階段一致努力以赴的目標。二十八年西昌行轅成立之初，主任張篤倫即在內部設置經濟建設設計委員會，延聘當年享譽中外之煉鋼專家雷寶

華、水利專家李書田、周宗蓮、地質專家常兆寧，及前交通大學校長胡博洲等爲委員，前中東鐵路督辦莫德惠爲顧問，從事寧屬經濟建設之策劃與諮詢。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賀國光奉派繼任行轅主任後，組成川康滇邊區邊務設計委員會，盤訂開邊治夷各種方案，其主旨即在規劃開發邊區經濟資源，嗣經多年調查統計，估計鐵礦儲量約三千萬噸以上，煤礦約三萬萬噸，金礦約十萬兩以上，銅礦約一千五百萬噸，鉛、鋅、銀礦約五百五十萬噸，食鹽年產六萬餘擔。除稀有金屬鎳、鈷、鉻、錳、鉛係新發現尚未開採外，其餘均用土法小規模開採，產量不多，但均納入川康經濟建設體系。

創辦報刊，傳播新知，注重精神動員。這是蔣公西昌戰略部署重要的一環。行轅主任張篤倫履任前曾向蔣公請示機宜，蔣公告以邊區交通阻隔，訊息傳遞困難，西昌行轅除應積極開發交通外，似可籌辦一報紙，並命名爲寧遠日報何如？寧遠日報創刊於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七日，迄三十九年三月廿六日印出最後一張報紙，共計發行三千七百五十五號，初爲四開，勝利後擴版爲對開一大張，發行至西康全省及川康滇邊區。第一任社長張篤倫，第二任社長賀國光，行轅政治部主任張敦品爲發行人。副主任陸實和、王道平先後爲副社長，筆者爲總編輯。

抗戰期間，該報在邊區鼓吹「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之號召，對凝聚各方力量，增強對政府的向心力，共赴國難，發

揮了積極的作用。截亂之役，揭發中共禍國陰謀，實施思想作戰，更列為優先任務。截亂末期，大陸各大城市之報刊，均已落入中共的魔掌，寧遠日報孤軍奮鬥達數月之久。

支援策應川滇戰局

以西昌為基地支援策應川滇戰局，是一個很好的作戰方案。可以拒敵於岷江以北，保住西南半壁江山，繼續在大陸上與共黨週旋，以待國際情勢變化。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蔣公在廣州召見各將領，對保衛廣州之戰指示機宜後，於二十四日乘專機飛抵重慶，以謀解救西南的危機。

這時大陸情勢危疑震撼，李宗仁等所幻想的和談已於四月廿二日宣告破裂，二十三日蔣公在杭州約集國民黨中央常委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張羣、吳忠信、王世杰等舉行會議，決定成立「非常委員會」以應艱危。並昭告天下，共黨擴大叛亂，政府為人民的自由與國家的獨立，今後惟有堅決作戰，奮鬥到底。

和談破裂之翌日，南京棄守，太原淪陷，接着武漢撤守。戰火很快由華中、華南向西南迫近。於是保衛大西南的任務，乃迫在眉睫。

蔣公赴渝之前已接獲川康滇政情不穩之情報，至為焦慮。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曾於六月廿七日來臺北向蔣公報告川省近情，謂熊克武等以中間路線之姿態，作通敵之準備。蔣公立囑王氏對川中抗戰有功的將領，一一設法安置，俾免為敵所乘。

抗戰勝利後，曾一度代理雲南省主席的李宗黃於八月二十日向蔣公報告滇省情況甚詳，建議對以雲南為西南根據地之基本問題，應早有準備與決定。意思是對雲南未來之變故要「防微杜漸」，「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八月二十九日蔣公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召集川康滇黔各省主席與川陝甘及川鄂湘各邊區將領開會，檢討各方情勢，決定作戰部署，雲南盧漢果未到會，證實雲南有了問題。

蔣公審度當時情勢，放心不下，乃派李彌將軍回滇，先作初步之部署，並決定解決雲南問題之原則，應以政治為主，避免流血。蓋以西南各省為我抗日戰爭時期之最後根據地，沒有西南，抗戰不會成功，所以對於川滇問題之處理，亦特別重視與審慎。

中央大計已定，立即付諸實施。而盧漢突於九月六日赴渝，透過張岳軍晉謁蔣公於林園行館，剖析苦衷，矢述精誠，痛哭流涕者再；但旋於餐敘時，竟要求增編滇省部隊六個軍，並與以現洋二千萬元。蔣公對盧撫慰有加，懇談達二小時之久，申之以道義，動之以利害，建議政府發給經費銀洋一百萬元，囑即貫徹既定之清共政策。

九月十日，盧漢在昆明開始行動，解散省參議會，逮捕反動份子，昆明情勢確曾一度穩定下來。但自十一月一日李宗仁到昆明之後，又陷入混亂狀態。因李以巡視為名往訪，竟循地方人士之請求，對被捕之反動份子批准「從寬辦理」，而盧漢亦未經呈准長官公署逕予全部開釋。此輩恢復自由後，更多所活動，對盧包围愈甚，盧遂復

萌異志，最後演出十二月九日通電降共的一幕。

守住岷江足可決戰

對於川康問題之處理，蔣公在渝數度垂詢西昌警備總司令賀國光（兼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之意見，賀氏曾密呈川康政情外弛內張，建議對可能發生之變故，應預為防範，其與八月二十日李宗黃對滇局之建言，可謂不謀而合。賀氏並建議「國軍轉守岷江延伸至雲南之線，以雅安、西昌、會理為後方基地，派重兵駐守雲南，負固西南邊區，國事仍大有可為」。

賀氏所提作戰構想，據筆者推斷，可能未在西南軍政會議提及；一則因當時檢討各方情勢，決定拒敵於川境之外，即以隴南與陝南為決戰地帶，而不在川境之內與敵週旋；再則因劉文輝、鄧錫侯之輩同時與會，不能不有所顧慮。但以後川康軍情發展，大抵不出賀氏之所料，惟成都、昆明發生肘腋，以致岷江以北及金沙江以南之地區未能堅守。

賀國光曾任南昌行營及重慶行營參謀長，二十四年率參謀團入川，當時中央對川康重大問題之處理，如政治之革新、軍隊之改編等等，多由賀氏負責協調；尤其自二十八年起，歷任成都行轅主任、四川省政府秘書長、重慶特別市市長、憲兵司令、重慶衛戍副總司令及軍委會辦公廳主任等要職，故其所提國軍改守岷江之建議，甚獲蔣公重視。

華南戰事逆轉，西南局勢進一步惡化，昆明混亂，貴陽告急，川東陷落，重慶垂危，於是蔣

公在各方函電敦促聲中，於十一月十四日再度自臺北飛抵重慶坐鎮，以挽危局。甫下機，在歡迎之人羣中吩咐賀國光速返西昌防地。賀氏要求增加必要之兵力，蔣公告以「我已告訴墨三（顧總長）儘速調派空運。」

按西昌警總當時所能掌握運用之部隊，僅有直轄警備團步兵二營，臨時擴充為三營，由重慶空運補給武器彈藥。另靖邊司令部有一個靖邊團、四個夷務團、十五個獨立大隊。

在野戰部隊方面，則由胡宗南部自陝南抽調一部份兵力，責成兵團司令裴昌會率領，循川陝公路秘密向西康開拔。另由第一軍自重慶空運一個團先遣部隊前往西昌，唯因天候及通訊等問題未能配合，故僅有六個連空運到達。

又為免引起對方注意，胡部先遣部隊係由第一師師長化名朱光祖團長率領，以當時情況而言，這種保密措施是有必要的。至於裴昌會兵團行抵遂寧，奉調緊急增援重慶防務，以汽油缺乏，數百輛汽車擁塞於途，以致未能及時趕到；而羅廣文所部已於南川、綦江之線潰敗，重慶遂於十二月一日失守。

靖邊部隊擊潰叛軍

西昌支援策應川滇戰局有力之行動，厥為十二月十一日擊潰劉文輝一個師的叛變，而使西昌於風雨飄搖中屹立不搖，成為堅強之反共基地。抗戰前夕川康整軍完成後，劉文輝部編為第二十四軍，轄一三六、一三七兩個師，駐防西昌、雅安、康定等地，分別由西昌行轅、成都行轅節制。

三十八年十二月一日重慶陷落，行政院遷到成都辦公，整個四川境內已是兵慌馬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然而西昌却出現暴風雨前夕一樣的平靜，市區安堵如恒。惟這種情況僅維持了一週，十二月九日，西昌市面即已盛傳劉文輝在蓉降共。入晚，賀國光輾轉獲悉，一三六師師長伍培英（劉文輝的女婿）已收到了劉文輝的電報：「我與晉康（鄧錫侯）於佳日通電擁護人民政府毛主席、朱總司令。」伍培英並於當晚邀集當地的軍政首長及地方士紳開緊急會議，會後將劉文輝來電抄送賀國光一份，盼望賀氏表明態度。

翌日，賀國光接見當地士紳時表示：「我不會做投降將軍。」這句話堅定了靖邊司令孫仿擁護中央的信心。經過連日遊說鼓動，伍自知要「和平解放西昌」已不可能，乃於十一月深夜率部撤離城區，計劃於禮州會合其他部隊再圖反攻，迫訂城下之盟。賀國光當機立斷，迅即下令攻擊，就在城郊至機場以迄濫沽途中，經三小時激戰，將叛軍擊潰。是役警總參謀長程冠珊策劃協調頗力，警總警備團、胡部朱團及靖邊部隊協同截擊，克奏膚功。

籌建長期反共基地

蔣公於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到臺灣後，初居高雄壽山，當時會想赴西昌巡視，因為情況不明，路途困難，曾被左右勸阻；後來移居大溪和草山（陽明山），還是考慮到西昌去長住，並且要以西昌為長期抵抗中共的根據地，臺灣方面則由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負責。同年八月及十一月，蔣公

兩度赴渝挽救西南危局，更時時以增強西昌的防務為念。

當行政院於十一月廿九日遷至成都辦公後，蔣公會與閻錫山院長及西南軍政長官張羣等數度研究中央政府駐地問題，最初，擬遷西昌固守西南，俟機反攻，收復失土。但後來考慮兩個因素，一是蔣公於十二月七日約劉文輝、鄧錫侯到成都陸軍官校來見，彼等竟避不應召，反來函說：「王方舟主席與其為難」。二是盧漢既不顧大本營常駐昆明，亦不肯接受滇黔剿共總司令名義，其媚共心態與劉、鄧如出一轍。乃於當晚作成重要決定：中央政府遷臺灣臺北，大本營設置西昌，成都設防衛司令部，以示作戰決心。

十二月八日，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決議遷都臺北，並在西昌設總指揮部，繼續與共黨作戰。當時，張羣長官由昆返蓉報告盧漢動向，蔣公心知有異，乃召見由滇來蓉之第六編練司令兼第八軍軍長李彌、第九兵團司令兼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第九十三軍軍長龍澤澆，訓示其必須保衛雲南，不能作撤退迤西之想；並囑轉告盧漢堅定執行原定之部署，軍費中央可設法負擔。

十二月九日，張羣長官奉命再赴昆明安撫盧漢，李、余、龍等偕行，飛機抵昆明後被扣，事變發生。盧漢除一面致電劉文輝，要劉會同四川各將領扣留蔣公，戴罪圖功；一面致電賀國光，勸賀「起義」靠攏，同日，劉文輝、鄧錫侯在成都通電降共。

蔣公召集胡宗南、王陵基、楊森、蕭毅肅等將領研討對滇事處置方略後，於十日下午二時離

成都飛返臺灣，六時許到達臺北；採納當時在蓉文武官員一致之要求，未先飛西昌。翌日，劉文輝在西昌的一三六師被消滅，賀國光於十二日傍晚以載波長途電話向蔣公報告戰果，經國先生接聽後，即請蔣公親自講話，慰勉有加，並告以「我還要來西昌。」

不久，成都失守，西南戡亂進入更為艱苦之階段。而西昌擔負起最後一戰的艱鉅任務。

軍民並肩作保衛戰

正當西昌保衛戰序幕初啓之際，國際間傳來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三十八年十二月六日，我駐美大使顧維鈞電告蔣公說：「美國正洽告有關各國，在我國於大陸上繼續作有組織抵抗期間，美國不擬考慮承認中共問題。」同月三十一日，美參眾兩院通過「繼續援華法案」。西昌寧遠日報當即以此作為三十九年元旦頭條新聞，配以短篇新聞分析。同時，以賀國光為主席之新西康省政府，這一天在西昌成立，一時邊區軍民大為振奮！

在蔣公三十八年第一次赴渝之前，毛澤東於七月一日發表「一邊倒」向蘇聯之政策聲明，使美國親共份子大失所望，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不得不於八月二日悄然離開南京，無法再事觀望了。然而，菲律賓總統季里諾、大韓民國總統李承晚，却分別於七月十日及八月六日邀請蔣公分訪非、韓，共商遠東反共大計，則顯示彼時之國際形勢仍尚有可為。

西昌既已設置軍事大本營，故增加兵力，強

化防務，乃屬當務之急。蔣公於獲悉胡宗南將軍抵達海南島後，當即電令其速飛西昌，與賀國光共建西南戡亂最後之據點。並親擬空軍與胡部聯繫支援辦法，規定以一百架次飛機由海南島向西昌運補軍火及軍需物資；據悉，均於限期內安全運達。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胡宗南以西南軍政長官身份，率領參謀長羅列、秘書長趙龍文，及周士冕、李猶龍等將領乘空軍專機飛抵西昌，當九架 C-54 運輸機以密集隊形進入安寧河谷時，西昌這座寧靜的山城為之震撼，而軍民則翹首相慶，歡愉不已！

這時蔣公再度考慮要到西昌去，於是有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經國先生的西昌之行。在此前數日，參謀總長顧祝同將軍，奉蔣公之命由雲南蒙自逕飛西昌，密商滇境國軍與西昌相互空運支援辦法，可見蔣公此時要去西昌之意向甚堅。

經國先生抵西昌後，曾分別與胡、賀兩將軍及其幕僚會議，一致認為成都已失，從四川通往西康的大道無法使用，而且西昌地區多山，平地不多，糧食供應不易，不可能維持大軍，對外交通亦極不便，政府設置於此，定有困難。同時，滇境國軍情況亦不良好，臺北、西昌與李彌、余程萬多日未能取得連絡，顧總長專機自西昌返航時，蒙自機場已不能降落。蔣公獲悉上情後，經過一夜思考，西昌之行遂罷。蔣公認為西遷不安，乃將大陸東南以及山東所有的兵力集中保衛臺灣，以臺灣為復興的基地，而臺、澎、金、馬得

英勇壯烈血戰數月

西昌經過三個月的積極經營，防務已告強化。國軍從川西突圍來到西昌的官兵，已陸續整補完成，顧葆裕、劉孟廉、胡長青等軍長重新參加了部隊的整訓工作，靖邊部隊及民團亦已調整充實，如張玉麟部之擴編為師，鄧德亮部之擴編為縱隊，戰力均較前有所增強。尤其難得的是西南長官部西昌幹訓團，招訓數以千計的邊區青年，經過嚴格的訓練，業已成為重新建軍的基幹。

前四川都督尹昌衡、前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兼廿一軍軍長唐式遵，以及富林耆紳羊仁安等，當時均年屆古稀，為響應政府團結反共之號召，於三十九年三月初，不辭艱險，自川西間關來到西昌參與反共行列。唐式遵乃抗戰初期協助劉湘統率十萬川軍赴上海抗日之有功將領，西昌撤守時抱病返川從事游擊戰，不幸中途遇襲，壯烈成仁，其精神志節尤為感人！

西昌之戰，中共方面係由劉伯承統軍，動員賀龍所屬的一個軍，由樂西路上的黃木廠，雅富路上的漢源，兩路向南推進；另路劉伯承和陳賡廣的兩個軍，聯合龍純曾、高槐等土共約八千人，於越過金沙江後，分由寧南、會理北進。西南面的土共朱家璧約萬人，則流竄於兩鹽一帶，牽制諸葛世棟的民團。

我軍分路拒敵，英勇作戰，戰果豐碩，寧南大捷，康定光復，造成西南戡亂以來空前之勝利，聲勢大振。但我漢夷部隊及民團合力阻敵強渡金沙江，血戰兼旬，死傷枕藉，尤其胡長青軍長、

邱純川團長等多位將領壯烈殉職，可歌可泣！胡宗南部參謀長羅列（來臺後升任陸軍總司令、國防部副參謀總長）於敵騎竄抵西昌城郊時，從容偕同周士冕、李猶龍等高級將領隨部隊轉進山區，繼續奮鬥，忠勇可風！西昌保衛戰，是西南戡亂最後一役，敵我相持數月，接戰千里，當地的漢夷人民，同仇敵愾，從無一人插白旗，地方秩

序維持到最後一秒鐘，依然相安如堵，可謂罕見。

孤城落日那堪回首

歲月悠悠，西昌大本營撤守，忽忽已屆三十年了；回憶當年蔣公兩度赴渝坐鎮，以挽西南危局，而李宗仁竟置國家民族命脈於不顧，一

拾夢抒懷序

周道濟

浙江嘉善李潔滌夫先生是一位可敬可愛的人。他早歲從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後，曾任浙江省郵縣縣長及行政督察專員等職。比來臺灣，先服務於行政院新聞局，任第一處處長，後又擔任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自民國五十四年起，改任正中書局總經理。六十二年，轉入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工作，七十一年，獲准退休。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我奉王雲五老師之命，辭去中國文化學院教務長之職，就任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由於業務關係，很快地認識了滌夫先生。

當時，這裏的出版界爲了中小學教科書的印售問題，彼此之間意見很多，滌夫先生折衝協調其間，備極辛勞，但也由於這個緣故，使我們很多出版界的同仁，一致認爲滌夫先生的確是一位排難解紛的長才。

民國六十三年，我離開商務印書館，來到臺大教書，而與滌夫先生的往來却從未中斷。漸漸地，我對滌夫先生有更深的瞭解：他心地善良，做事能把握原則，對於社會人情，觀察透徹，分析入微；他曾多次出國訪問，見聞廣博，生活也多采多姿，應酬之際，健談自若，頗有赤子之心（這是長壽的象徵）；他不但擅長中文寫作，在英文方面，亦有很好的基礎。

自民國七十一年起，滌夫先生在中外雜誌常有文章發表，這些文章所述者雖多爲滌夫先生過去生活的片段，但能以慧眼傾抒其感觸，滙爲智慧的結晶，故與一般回憶錄並不相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自是另一種享受。

今者，滌夫先生特將發表於中外雜誌的文章歸爲一集，名之曰「拾夢抒懷」，在出版前夕，屬我寫一篇小序，我以相交有素，欣然應命，於是乃有如上之介紹。

走了之。

尤有甚者，當三十八年初，中共擴大叛亂，局勢逆轉之際，李宗仁身爲副總統，竟不圖輔弼元首，團結國人，撥亂反正；反逞一己之政治私慾，千方萬計，逼迫蔣公引退，導致整個大陸河山於數月之間淪於敵手，而國家與人民慘遭萬劫不復之厄運，凡屬國人，誰不言之痛心！三十八年秋，蔣公飛重慶救難之日，吳稚暉老先生無限憤慨地說：「萬不可使李宗仁脫卸其政治上應負之責任。」實代表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聲。

蔣公畢生革命，救國救民，其豐功偉績，如日月經天。西昌邊陲之地，實不足以彰顯其德業於萬一。

然而，自抗戰以還，蔣公對西昌特予重視，刻意部署，使成爲抗戰與戡亂之重要基地，而這一邊城的地緣價值也得以充分發揮。

今年是蔣公百年誕辰，我從四月五日慈湖謁陵歸來，永懷領袖之恩。棼迴腦際，無時或已，忽憶起三十九年撤退來臺後，曾以范仲淹所作之「漁家傲」爲調，填了一闕小詞，以抒所懷，茲錄於次，作爲本文的結語。

西昌撤守（調寄漁家傲）

邊塞孤城終撤守，九州日月竟歸紂！萬劫歸來何所有？空回首，傷心徒憶邛瀘柳。

赤禍包藏罪不宥，紅潮泛濫難辭咎。最後戰爭誰勝負，曾記否？殘民暴政難持久。